

中国印刷史丛书

第八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养志 施继龙 主编



印刷工业出版社

中国印刷史丛书

第八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养志 施继龙 主编

印刷工业出版社

# 《中国印刷史丛书》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笔画排序)

主 编: 曲德森

副主编: 方晓阳 史金波 许文才 李致忠

肖东发 张连章 张养志(常务)

张树栋 郝振省

编 委: 丁 一 马贵斌 方晓阳 文 静

史金波 许文才 李 英 李致忠

曲德森 肖东发 张连章 张养志

张树栋 陈敬良 罗志雄 施继龙

郝振省 魏 欣

顾 问: 武文祥 魏志刚

## 《第八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张养志 施继龙

# 《中国印刷史丛书》总序

中国是人类印刷术的发源地。据文献记载和文物考证,中国发明的印刷术曾经领先世界达千年之久。在这千年之中,中国人不仅发明了雕版印刷,还发明了活字印刷。其中在雕版印刷方面,发明了单色雕版印刷和谓之套印术的彩色套版印刷,如发展至今精彩绝伦的彩色套印术——木版水印,复制技艺之精湛,达到了“几可乱真”的程度,被国际友人称为“真正的印刷艺术”。在活字印刷领域,连续创造发明了木活字、泥活字、锡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技术系列。此外,蜡版、活字泥版和泰山磁版堪称印刷发明的“三枝奇葩”,使中国古代印刷术成熟完善而又熠熠生辉。

近代中国印刷术经历了浴火中重生、压力中奋斗与崛起的艰难历程。随着以机械印刷为特征的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中国印刷术被推进到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从西方引进的机械印刷术用于数以万计的汉字和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印刷,需要一个吸收、改良的艰难发展过程。中国印刷术因而承受着引进和吸收的双重压力。在中华民族面临多事之秋、危亡之际,中国印刷界勇敢承受压力,完成了向机械印刷的过渡和转型,中国近代印刷业昂然崛起,中国印刷术得以薪火相传、持续发展。

当代中国印刷技术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实现了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中华印刷术以崭新的时代风貌,紧跟世界潮流,自主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稳步进入了以电子控制为特征的新时代。以王选为首的中国印刷科技专家,突破了汉字高倍率压缩等一系列难关,完成了中国印刷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使印刷术的故乡再次跻身世界印刷技术先进之列。

回顾往昔,我们因先辈发明的印刷术推动了人类文明事业的持续发展而自豪,为近代国家的积贫积弱导致印刷术的落后而惋惜,更为当代中国创造性地实现中国印刷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而振奋。历史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而它饱含的文化底蕴却是留给后人取之不尽的资源和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中捡拾可用于创新发展的贝壳和宝藏,正是中国印刷界积极倡导筹建印刷博物馆和开展印刷史研究的初衷所在。

近30年来,伴随着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和外人争我印刷发明权的激励,

投身印刷史研究的学者逐渐多了起来。包括《中华印刷通史》在内的数十种印刷史专著的出版,数以百计的印刷史论文的发表,连续六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和与印刷史有关而又难以计数的座谈会、论证会、文物鉴定会的召开,印刷史研究可谓高潮迭起、盛况空前、硕果累累。在这样的情势下,为了引导印刷史研究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把有志于印刷史研究的专家、学者集聚起来,发挥集体优势和协同效应,有组织、有计划、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印刷史,我们于2001年5月24日成立了“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史研究委员会”(下称印刷史研究会)。印刷史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印刷史的研究进入了系统研究的新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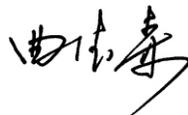
印刷史研究会成立后,在武文祥会长的领导下,在印刷史的学术研究、印刷文物的征集与复制、印刷史的科普宣传、支持《中华印刷通史》等专著的出版和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诸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遵照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加强中国印刷史研究,要立课题”的重要指示,在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下组织有关资深专家、学者,经反复调研论证拟订了“关于深入开展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明研究的课题计划”,并落实到人、付诸实施,给印刷史研究以巨大的推动,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研究印刷史的重要标志。后因众多复杂因素,此计划曾一度搁置。

2009年8月11日,在北京印刷学院召开了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史研究委员会第二届委员大会。这是印刷史研究会的换届大会,又是印刷史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这次大会的最大亮点,是两届领导都明确表示要把上届研讨会未能完成的课题“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明的研究”作为研究会的重要工作重新启动。为此,大会还采取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深入开展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明研究”议案,表达了对进一步开展印刷史研究的重视和决心。会后,新一届印刷史研究会主任办公会通过并成立了“中国印刷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旨在将印刷史研究的成果,以系列专著的形式予以出版,让中华印刷文明带给国人以新的惊喜和骄傲!

《中国印刷史丛书》的编纂与出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填补历史空白的《简明中国印钞史》已经出版,正在编纂和计划立项研究的《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中英文对照本)、《清代北京纸币印刷研究》、《中国活字印刷起源与发展研究》、《中国印刷科学技术史》、《中国少数民族印刷史》、《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明原始资料汇编》、《中国印刷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中国印刷产业发展史》、《中国印刷教育史》、《中德印刷史比较研究》等一系列课题研究成果与著述将陆续纳入“中国印刷史丛书”出版计划。我们相信,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定会出色而完美地完成这项中

华印刷文明系统研究和出版工程!

人类总是在发明创造中解放和完善自己,印刷术之所以源远流长,是因为印刷术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流变同步,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期待着有志于印刷史研究的海内外同人紧密团结、互相交流,为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印刷史,弘扬中华印刷文明,深入推进中国印刷技术的现代化,携手前行!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characters: '曲', '振', and '东'.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fluid, cursive style.

中国印刷协会印刷史研究会主任委员  
“中国印刷史丛书”编委会主编  
2009年11月26日于北京印刷学院

# 前 言

“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是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印刷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系列会议,自 1992 年至 2010 年已举办 7 届并出版论文集。为了进一步推动印刷史的深入研究和成果普及、交流研究成果,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印刷博物馆于 2013 年 8 月 17 日至 18 日在北京联合主办了“第八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

第八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主题有:1. 印刷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动向;2. 传统印刷的传承发展与产业化;3. 印刷品保护修复与科学技术研究;4. 印刷类博物馆(展览馆、陈列馆、艺术馆)建设与发展。参加本次会议的共有 60 余位代表,分别来自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印刷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上海印刷出版高等专科学校、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上海印刷博物馆、文津雕版博物馆、首都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扬州图书馆、北京恒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波海曙东东书保院有限公司、中国吉页文化出版有限公司、金融时报社、深圳电视台、中国新闻出版报社等单位。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30 余篇。

为了体现本次会议的学术成果,推动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会议主办者将本次会议研讨的部分论文编辑成册,呈现给科技史、印刷史研究者以及广大读者。对文中作者的学术观点,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责自负,尊重作者的原则,编者未对文章内容进行改动,只对个别描述做了必要的调整。

本文集编辑工作由北京印刷学院张养志、施继龙完成。限于编者水平和经验,可能会存在问题和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3 年 9 月 20 日

# 目 录

|                                            |            |
|--------------------------------------------|------------|
| 再谈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                           | 李致忠( 1 )   |
| 中国早期文字木雕版考 .....                           | 史金波( 6 )   |
| 雕版印刷技艺溯源与辨析 .....                          | 张树栋( 18 )  |
| 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西传和西方木刻史 .....                     | 魏志刚( 25 )  |
| 《古今图书集成》所用开化纸的实验分析<br>..... 邓 亮 高 瑄 王雪迎    | 冯立昇( 28 )  |
| 普贤形象与玄奘“印普贤像”<br>——《玄奘“印普贤像”质疑》商榷 .....    | 章宏伟( 37 )  |
| 《佛说长寿命经》与云南印刷业的开端 .....                    | 李晓岑( 51 )  |
| 试论古籍雕版之厄与存世雕版的保护与利用<br>——以故宫博物院藏雕版为例 ..... | 翁连溪( 56 )  |
| 奇人奇书《泛槎图》 .....                            | 宋平生( 68 )  |
| 编辑小考 .....                                 | 徐忆农( 75 )  |
| 晚明徽州的商业印刷 .....                            | 李啸非( 81 )  |
| 民国旧笺书画刻印的兴衰嬗变 .....                        | 王艳云( 89 )  |
| “双印”考 .....                                | 刘向东( 95 )  |
| 从影印本看元朱墨套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的印刷方式<br>.....      | 艾俊川( 103 ) |
| 中国彩印两千余年 .....                             | 李 英( 109 ) |
| 清代“蜡版印刷”实证综述 .....                         | 赵春英( 111 ) |
| 科学家小型纪念馆特色建设探究<br>——以王选纪念陈列室为例 .....       | 丛中笑( 117 ) |
| 浅析古代历书与活版印刷 .....                          | 邹 毅( 126 ) |
| 当前雕版印刷工作中的几点建议 .....                       | 李大东( 135 ) |
| 《武英殿聚珍版书》与聚珍版书之著录种数考述 .....                | 刘甲良( 136 ) |
| 技术发展与文化需求<br>——试论雕版印刷术对东亚文化的影响 .....       | 袁 淮( 145 ) |

|                             |              |
|-----------------------------|--------------|
| 宋代的广告印刷 .....               | 高 飞(153)     |
| 从出版标记看民国动荡历史对其印刷设计的影响 ..... | 刘 倩 王艳云(158) |
| 弘扬中华文明 传承印刷文化               |              |
| ——不断完善“中华印刷之光”巡展 .....      | 秦国林(165)     |

# 再谈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

关于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古今中外很多学者参加了讨论,提出了种种说法,但迄今尚无令人绝对信服的结论。本文仍以探讨的态度提出一些论据,力图从中得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结论,给人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确定一个发明的历史时段。

## 一、几条值得注意的论据

1. 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写过《有关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文,分上下两期,发表在台湾省《故宫文物》月刊1988年6、7两期上。其文引据唐代高僧法藏在《华严五教章》和《华严经探玄记》中解经借喻的记载,提出了印刷术中国初唐发明说。

法藏所著之《华严五教章》(《大正大藏经》第四十五卷所收)曰“教起前后,是故依此普法。一切佛法并于第二七日。一时前后说,前后一时说,如世间印法,读文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现。同时前后,理不相违,当知此中道理亦尔,准以思之。”

法藏所著之《华严经探玄记》(《大正大藏经》第三十五卷所收)卷二曰“二摄前者有三重,一于此二七时。一于此二七时,即摄八会。同时而说,若尔何故会有前后。答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

这里出现了“印文”和“印纸”的提法。法藏是《华严经》的传人,他以华严宗独特的教理普法。为了阐明该经玄深的经义,他经常深入浅出,借助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事物来比喻,从而达到让听者理解的目的。神田喜一郎引证这两段话,就是法藏讲经时的借喻。“如世间印法,读文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现。”“同时为说,若尔何故会有前后?答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其意是说讲解佛法经义时其讲话总有前有后,如同世间印刷文稿一样,读文稿的时候句义上总有前后之分,可是印制它的时候,印文印纸却是同时刷印出来的。让人一下就能明白,所以恰如其分的比喻,确能解释深奥的玄理。而这两部书的成书,

据日本人松原恭让所撰写的《佛书解说大辞典》，说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撰写在他四十五至五十岁之间，如此则被神田喜一郎推定在唐中宗嗣圣四年，其实已是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到天授三年（692）。但据华严宗的专家日本人汤次了荣所撰《华严五教章讲义》所说，法藏撰写《华严五教章》是在写《华严经探玄记》之前。据此神田喜一郎则推断《华严五教章》当完成在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前后，那是法藏不过三十来岁。在唐高宗时代的世间印刷之法就能被法藏引来作为解经的比喻，让弟子们能听懂，显然在此之前和在此之际，这种雕版印书活动一定已是不稀见的现象，稀见了，就无资格被借喻来为人释惑解疑。果如是义，则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初唐，即7世纪的中下半叶之前当是可信的。

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记载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十月以印纸遣王庆之：

天授二年“冬十月己酉，长倩、辅元、通等皆坐诛。王庆之见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太后谕遣之。庆之伏地，以死泣请，不去。太后乃以印纸遣之，曰：‘欲见我，依此示门者。’自是庆之屡求见，太后怒之，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庆之杖。”此处又出现了“印纸”一词，这种“印纸”似乎是进出宫禁的凭证。出进宫禁，十分不易，没有凭证，难得进出。而这种凭证一定得格式统一，不易仿造，所以需要印制。

3. 《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条记载太府寺“丞，掌判寺事，凡左右藏库帐禁人之有见者，若请受输纳人名物数，皆著于簿书，每月以大摹印纸四张为之簿，而丞、众官同署，月终留一本于署。每季录奏兼申所司。”其中“大摹印纸”，当是大张的摹刻的印纸之义。又出现了“印纸”一词，而且是大张的摹刻而成的“印纸”。

4. 《旧唐书》卷五十《食货志下》记载“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意是说，市场贸易，有牙行作为中介。对这些中介人要各发给其“印纸”，以便随时登记贸易情况，第二天进行核算。这种“印纸”似乎是交易纳税的凭证。这种凭证大概也是需求量大，格式要求统一，不易仿造，所以也需要印制。

5. 《唐会要》卷八十四《杂税》载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算率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日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簿者，投状自集。”这段记载与《旧唐书·食货志》相同，只是明确了年份。

6. 宋叶氏《爱日斋丛抄》卷一引唐柳玭《柳氏家训序》记载唐僖宗中和三年（883）以前成都雕印各类杂书：

“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鸾舆(指僖宗)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占卜、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见《四库全书》子部《爱日斋丛抄》卷一)“鸾舆在蜀”,指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先后攻陷东、西两京,僖宗避难,逃往成都。中和三年,已是僖宗驻蹕成都第三年,故有“鸾舆在蜀三年”之说。柳玘在这一年的夏天,利用旬休,于成都东南市肆所见之书虽不是什么高文典册,但“率雕版印书”,只是印纸浸染,质量不高。表明公元883年以前,成都雕版印刷的书籍已充斥市场,而且被称为“雕版印纸”。

## 二、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 法藏(643-712)字贤首,号国一法师,又称香象大师、康藏国师。俗姓康。其先康居人,至其祖父,举族迁至中土,居于长安。藏早年师事智俨,听讲华严,深得玄旨。智俨示寂后,依薄尘剃度,时年二十有八。初,以其通西域诸国语及梵文经书,遂命其参与高僧义净译场,先后译出《新华严经》及《大乘入楞伽经》等十余部。又常为武则天讲解《华严十玄缘起》之深义,并借殿隅金狮子为喻,使武则天豁然领悟,后乃因之撰成《金狮子章》。法藏一生宣讲《华严》,并著有《华严五教章》、《华严经探玄记》、《华严料简》、《华严纲目》、《华严玄义章》等跟《华严经》有关的著作。唐玄宗先天元年(712)示寂,年七十。可知他示寂的那一年尚在初唐,因而其作《华严五教章》和《华严经探玄记》,则当更在初唐。初唐成书的著作,所言之事固在初唐时段(618-713)。且从他为武则天讲解《华严十玄缘起》借喻金狮子为比令武则天深深领悟来看,他大概惯于利用比喻为玄深的义理解惑,故其在《华严五教章》与《华严经探玄记》中借用世间“印纸”,来解释讲解经义时虽然会出现前后一时说或一时前后说,但完整的经义最后终究会合盘托出,它就像读文章,读时虽有前后,可是印制它的时候则是同时显现,一下完成。众所周知,世界上凡是借喻,其借喻的对象必是世人司空见惯谁都懂的事物,并且又必是普遍存在频繁出现的事物。否则,借喻生僻,很少人知,便达不到解惑的效果。此种分析果合乎常理,则公元677年成书之《华严五教章》借喻的“印纸”,应是在其成书前的社会生活中已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且须是频繁出现为世人所熟知现象。公元677年之前就普遍存在的“印纸”现象,当是雕版印刷术发明或说是出现在7世纪中叶或稍前的明证。

2. 自前所引《华严五教章》出现“印纸同时”字样后,到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又出现“太后乃以印纸遗之”之事。先是,洛阳人王庆之受凤阁舍人修武张嘉福唆使,纠集恶少数百人诣阙上表,请求废除已立太子,而重立武则天之侄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先是询问文昌右相、同鸾台凤阁三品岑长倩,长倩以为已

有太子在东宫,不宜再有此议。并奏请切责上书之人。武则天再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辅元亦固称不可。由是大忤诸武意。加之另有别罪,故岑长倩、格辅元、王通等相继被诛,于是王庆之便求见武后,并以死泣请不去,因而发生了太后“以印纸遗之”之事。并告诉他“欲见我,以此示门者。”显然,太后所遗之“印纸”,乃是进出宫禁的凭证。这种印制的凭证,唐朝人称为“印纸”。这“印纸”显然是印有字痕格式的“印纸”,门卫一看便知是出入宫禁的凭证。这种凭证若非印制,格式统一,则极易伪造,故宫里专门印之。

3. 前引《唐六典·太府寺》谓太府寺丞填写的账簿,“每月以大摹印纸四张为簿”。这种“大摹印纸”,当是摹刻印制的表格式的账册“印纸”。按《唐六典》三十卷,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始命陆坚修是书。时帝以白麻纸写理、教、礼、政、刑、事六条,令照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后张说又以此事委徐坚,思之经岁莫能定。又委毋斐、余欽、韦述,始以令、式入六司,而沿革并入注中。后又有张九龄介入其事,于开元二十三年(735)撰成。其后李林甫奉命作注,至开元二十七年(739)成书,独以自己的名义奏上之。可知《唐六典》的最后完成,再晚也不会晚过开元二十七年。而开元二十七年既已成书的《唐六典》,居然有了太府寺丞“每月以大摹印纸四张为簿”,来登录左右库藏输纳人名物数,可见此书成书以前政府的职能部门曾用印制的表格记账。而这种印制的表格账簿,时人也称为“印纸”。

4. 前引《旧唐书·食货志》及《唐会要》所记“市牙各给印纸”之事,发生在唐德宗建中四年(783)。这种印纸显是贸易市场中介人使用的买卖登记单,这种单据要随日署记,所记项目要统一,故大概也是表格式,需要印制。这种印制的记录单,唐朝人也称为“印纸”。这样,我们似乎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印有表格或文字的纸,唐朝人统称为“印纸”。讨论至此,要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推定一个时限,好像不必有什么顾虑了。但不然,也许还会有人提出,前面引述的“印纸”,是印制的,可以不用质疑,可怎么就敢断定它们就一定是雕版印刷,而不是雕版捺印的呢?且看前引唐柳玭的《柳氏家训序》。

5. 柳玭(?—894),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柳仲郢子。明经及第,补秘书正字。中和初,至成都行在,历中书舍人、御史中丞。他在中和三年夏,利用旬休,在成都东南所见之书“率雕板印纸”,只印纸浸染,质量不高。这里出现之“印纸”的概念,既不是什么出入宫禁的凭证,也不是市场交易的记录单,更不是登账用的账簿单,而全部是雕版印制的书籍。这是唐朝人为唐时所称呼之“印纸”做出的诠释。原来雕版印制的单页印刷品可称为“印纸”,雕版印制的书籍也可以称为“印纸”。因知这“印纸”一词,确可拿来作为雕版印刷术发明的证据,以讨论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历史时段了。总此,我们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定在7世纪中叶或稍早一点,或者论为初唐发明说,当不会被指斥为牵强附会吧。

6. 以前谈雕版印刷技术被政府,特别是被中央政府所采纳,始于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国子监始刻《九经》。其实五代国子监采纳雕版印刷技术刻书,始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四库全书》本宋汪应辰《文定集》卷十,有一篇《跋贞观政要》的文章,称“此书婺州公库所刻板也。予顷守婺,患此书脱误颇多,而无他本可以参板(校)。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版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则阙之,以俟他日闲暇寻访善本,且参以实录、史书,庶几可读也。时蒙恩除知福唐,且有旨促行,冗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灯下书。”汪应辰(1118—1176)字圣锡,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上饶)人。初名洋,南宋绍兴五年(1135)进士第一,高宗特为改今名。初授镇东军签判,召为秘书省正字。绍兴三十二年(1162)出知福州。累官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并侍读。淳熙三年(1176)卒,年五十九。跋中所谓“此书婺州公库所刻板也”,乃指《贞观政要》有婺州公使库刻本。然此本脱误颇多,无他本可以参校。“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版本也。”可知刘子驹出示其家五世珍藏的《贞观政要》,乃是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国子监所刻。此为通常所知中央官署中国子监采用雕版印刷技术印制四部书籍的最早记录。然因有了上述关于“印纸”的记载,无论是武则天发给王庆之出入宫禁凭证的“印纸”,太府寺丞所用的“大摹印纸”,还是发给市牙作为交易记录的“印纸”,都是唐代中央政府采用雕版印刷技术的实证,只是还没有成规模地印制书籍。待政府采用雕版印刷技术成规模地印制书籍,人类文明已跨进了新的历史阶段。

# 中国早期文字木雕版考

史金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提 要:**在历史上,印刷术是包括两大类,即雕版印刷和活字版印刷。这两种印刷术在发明的时间上有先后,在制作技术上有传承,在实际应用上有交叉和衔接。中国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后来经过几百年的应用和发展,又于北宋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991年维修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时出土的数量巨大的西夏文木雕版,使中国早期木雕版零星传世的局面得以改变,大大拓展了中国早期雕版印刷的实物资料,显示出中国中世纪雕版印刷的丰富多彩的内涵和高度发展水平。

**关键词:**印刷术 西夏文 木雕版

## 一、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文字木雕版

文字的创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甚至可以说是文明社会产生的标志。文字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视觉形式,它不仅记录语言,而且比语言更加清晰,可以反复阅读,因而延伸了语言,使原来只能口耳相传的信息得以长期保留,传至异地,传至后世,使人类的知识不断叠加积累,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长足发展。

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人类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又发明了使文字化身千百、广泛传播的印刷术。印刷术为中国首创。在历史上,印刷术包括两大类,即雕版印刷和活字版印刷。这两种印刷术在发明的时间上有先后,在制作技术上有传承,在实际应用上有交叉和衔接。中国最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后来经过几百年的应用和发展,又于北宋年间率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中国于隋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当时的中国文字广泛应用,又有纸的发明和长期使用作为物质基础,加上社会文明高度发展,有大量文献的需求,这些构成了文字印刷发明的深厚背景。当时的世界上也只有中国才具有这样独特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对世界中世纪以后文明的

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现在所见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为唐朝初年。出土的实物中,唐代初期的印刷品已经不只一件,说明当时中国的雕版印刷已经很成熟,并有了相当的发展,至唐代中期雕版印刷术得到广泛的使用,至宋朝达到高度发展时期。

过去认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这件成熟、精美的早期印刷品发现于敦煌藏经洞,后于1900年被英国斯坦因盗走,今藏大英博物馆。该经卷首有释迦牟尼说法图,卷末有题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sup>①</sup>。清代末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一批古代印刷品,其中一件《妙法莲华经》,后流入日本,由中村不折氏保藏。日本印刷史学者长泽规矩也认为该经“有武则天异体字使用,为武则天去世不久刊本”<sup>②</sup>。1954年4月在成都望江楼附近的一座唐代墓中出土了唐代的印刷品《陀罗尼经咒》,首行刻款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因成都府始建于唐至德二年(757),而墓葬年代又不晚于唐大中四年(850)。此经时代定为公元757-850年<sup>③</sup>。1966年10月在韩国庆州佛国寺石塔内发现了刻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一卷,刻印皆佳,时代确定在公元704-751年之间。因此经始译成于中国唐武周长安四年(704),上有武周时期的制字。出土佛经的石塔始建于新罗王朝景德十年(751),其后未受到破坏。此经是在中国刻印后运往朝鲜并被保存在该石塔内的<sup>④</sup>。1974年西安唐墓出土梵文《陀罗尼经》,与其同时出土的随葬物早于唐初。经鉴定考证,该经为唐初印刷品<sup>⑤</sup>。早期雕版印刷除佛经外,还有社会上应用广泛的日历、字书、占卜之类的书。现存最早的世俗印本书籍是唐代乾符四年(877)具注历书。该卷首残,上部为历书,下部为历注。它也发现于敦煌藏经洞,1907年被英国斯坦因盗往伦敦,今藏大英博物馆。另大英图书馆还存有一件敦煌出土的唐中和二年(882)雕印的具注历,也是现存最早的雕印世俗书籍之一<sup>⑥</sup>。

鉴于早期雕版印刷品对印刷史研究的重大价值,加之一段时期有的国家个别学者对中国最先发明雕版印刷提出质疑,印刷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对早期雕版

①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44页。

② (日)长泽规矩也《和汉书の印刷とその历史》,东京版,5~6页。

③ 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12~13页。

④ 胡道静《世界上现存最早印刷品的发现》,载《书林》1979年2期。张秀民《南朝鲜发现的佛经为唐朝印本说》,载浙江省《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年4期。钱存训《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实物略评》,载《中国印刷》第28期。

⑤ 张树栋《社会文化发展是印刷术起源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载《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77年,27页。

⑥ 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11~12页。

印刷品十分关注,不少专家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进展。然而对雕版印刷另一种实物——雕版板片本身的探寻和研究仍显不足。雕版印刷的成品是雕版印刷品,而雕版印刷品是通过雕版板片印制而成的。原雕版本身附加着特殊的重要信息,如雕刻、印制、补改、板框、栏线、质地、纹理等,这些特性往往为纸质印刷品所缺乏,具有更为特殊的学术和文物价值。

然而存世的早期木雕版板片寥若晨星,似乎早期木雕板比早期雕版印刷品更难保存下来。其原因大概是一种文献的木雕版只有一种,而以此种雕版印出的印刷品则为化为千百份,甚至更多,历经千百年沧桑,虽多数损毁,但印刷品因数量大而能侥幸存留一二,雕版因量少更易泯灭。此外,雕版印刷完毕虽可保存以备再印,但一俟不再印刷或刮削后雕刻其他文献,或弃之成无用之物而遭淘汰,这也是早期木雕版稀见的原因之一。

至今唐代的木雕版尚未发现一片,即便作为被学界视为雕版印刷繁荣时代宋朝的木雕版也如凤毛麟角,十分稀见。现存宋朝雕版仅存三片,皆为1919年出土于河北钜鹿淹城遗址<sup>①</sup>。而其中真正的印刷文献的文字雕版板片仅有一件,今藏于美国纽约市国立图书馆的宋代佛经雕版,推断时间大约是宋大观二年(1108年)。同时出土的另两件木雕版入藏国家博物馆,皆为绘画雕版,其一高26.4厘米、宽13.8厘米,上部刻细花大幔帐,中间垂流苏两条,幔帐下有形态丰满、面容端正戴冠妇女三人,左下有楷书“三姑置蚕大吉”,右下有楷书“收千斤百两大吉”,内容似为蚕神神像版<sup>②</sup>。

近代西夏文献、文物大量出版,给西夏文字木雕版的探寻带来新的希望。

## 二、西夏文雕版是存量最多的早期文字雕版

一百多年前的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率领的一支沙俄探险队在中国北部的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掘获大批西夏文物、文献,被运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文物中就有保存完整的木雕版6块,今藏俄罗斯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sup>③</sup>。其中4块是文字雕版: X-2023号高8.7厘米,宽13厘米(图1); X-2025号高11厘米,宽17厘米; X-2026号高11.7厘米,宽16.7

<sup>①</sup> 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著、李兴才审定《中华印刷通史》,台湾省台北市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2005年。266页。

<sup>②</sup> 胡道静《雕版印刷的重要文物:宋雕版》,《中国印刷》第14期,1986年11月。胡道静《钜鹿北宋雕版是淹城遗址的出土物》,《中国印刷》第21期。

<sup>③</sup> (日)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经济新闻社:《スキタイトミルクロード美術展》,和田制本工业株式会社,1969年。图163。